

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促进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树立起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丰碑。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记者就如何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

记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英勇卓越的斗争。在不断的斗争过程中，中华民族也日益觉醒。五四运动是否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新开端？

耿云志：五四运动正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新开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清末开始形成的。那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为图自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激活起来。但在五四运动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带有明显的被动性。只是在被侵略、被压迫到不得已的情况下，民族意识才有所觉醒，并采取自卫的行动。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的民族觉醒进入新阶段。从1917年中国加入对德、奥两国的战争时起，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地为争取民族利益而斗争。由此，中国在战后得以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有机会在涉及中国权益的问题上说出中国人自己的意见，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完全听从列强的摆布。中国人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为后来争取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斗争留下了充分的合法性空间。在五四运动中觉醒起来的民族意识，已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一个国家的范围。由于中国人主动参与世界事务，增加了对世界的了解，认识到世界各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历史命运的共同性。从此，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世界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者：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耿云志：五四运动是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同前几年就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有直接关系的。一大批受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青年学生们，跃跃欲试地要把从他们老师那里学到的新思想付诸行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极大地刺激了他们，于是首先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游行示威，随后全国各地的学生陆续加入到抗议的行列。紧接着，工商业

者、工人、店员、学徒乃至一些乡村的农民也都参加到这场空前的爱国运动中来。广大群众的奋起，立即把一场文化运动推进到政治运动的轨道上来，新的政治革命高潮来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人以突出的印象。而在五四运动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沙皇时代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使长期以来苦苦寻求自救出路的中国人们眼前一亮。于是，许许多多热血青年纷纷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以他们所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应运而生。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吸收了来自苏俄的组党和动员群众的一些观念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加上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使之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

五四运动最核心的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就是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内除国贼是要铲除国内

五四运动：近代中国发展的新起点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

本报记者 叶帆

反动军阀及其所操控的政府官吏。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统治集团是人民解放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中，在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宣言中，都明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集团列为自己革命的主要目标。正因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国共两党有了共识，才为两党的合作创造了共同基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立即引导中国革命进入高潮，并很快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记者：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促进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从促进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耿云志：五四运动是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准备好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五四运动又把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激扬和扩展开来，使它成为中国民族文化振兴和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里程碑。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无数青年学生，不但自己找到了表达抗议的最好方式，而且有能力到社会上乃至到工厂、农村去宣传和组织广大民众。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社会知识精英、广大青年学生为先导，有社会各阶层首先觉醒的人士积极跟进，新文化运动

不仅规模扩大了，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自觉性。这种巨大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创造新文化的利器。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切入的，而文学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话国语的形成和广泛应用。语言文字是一种精神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的革新会大大解放生产力，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精神生产领域也是如此。白话国语的盛行，有利于推动新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界限，有利于各种人群、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所以，白话国语是一种最方便的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这是五四运动前后一个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是新教育的迅速发展。由于白话国语的推行，再加上新的教育观念的引进，尤其是1922年中国的新教育家们为中国制定出一个比较合乎近代标准又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学制系统，使中国教育事业

真正走上比较健全的发展轨道。从这些受过新教育的学生中，产生出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教育等各领域的新式领袖和骨干人才，他们成为后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

三是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了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经历清末民初几十年改革与革命运动的震荡，中国人一向尊君崇儒的文化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对怎样创造现代的民族新文化，仍然充满疑惑。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一方面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也逐渐减轻了清末以来形成的过分的民族自卑心理，由此造成了开放的、世界化的文化意识，使中国与世界文化良性互动局面的产生成为可能。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个人独立、个性解放的观念开始被承认，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人们逐渐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了全新理解，从此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得到了解放。这对于中国的进步，对于民族文化的振兴，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条件。

四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清末，中国开始形成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到五四时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得到蓬勃发展。这首先是由于新教育的发展，其次是由于社会团体组织空前扩展。五四时期

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团体，较之清末民初成倍地增加，而且大多数都提出了诸如变革人心、改造社会之类的远大目标。这些目标看似笼统，实际上反映出组织者们有了新的觉悟。许多社会团体为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办有小报或期刊，传播媒体因此大大发展起来。至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如公共图书馆、阅报社、剧场戏院等等，都比以前有巨大发展。所有这些，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对于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催生新的思想萌芽，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一些人在研究新文化运动时认为其存在某些激进主义倾向。对此应如何认识？

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如在维新运动期间，便有易簪、樊维等人主张一切尽从西法，以及谭嗣同的“冲决一切网罗”之说。辛亥革命时期，亦有国粹派批评的所谓“醉心欧化”等思想倾向。

造成激进主义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推动。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时时面临被列强欺凌乃至瓜分的危险，有志救国者和一般忧时之士，多有心急如焚的感觉，以救国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且愈来愈激进

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认为比较激进的人物，大多与政治运动特别是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激进主义是对长久以来的专制主义的直接批判和反对。政治上激烈的反专制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运动中反映出来。新文化运动中，虽然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稚晖等时有激进主义的和言辞发表出来，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基本主张大多还是比较理性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文化先觉者们起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时，常常会遇到巨大阻力。因此，他们通常比较注意反对和防范来自保守主义方面的抵制，却忽略了另一种社会现象，即尽管提倡者出于理性，但社会受众中却有一部分人因为自身的特殊境遇，往往把本来理性、平和的主张推向极端。这种事倒是很多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以后，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已经注意到某些激进主义的倾向带有相当的危险性，曾发表许多文章和讲演批评激进主义。同时还应看到，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负面的现象，我们不能指望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只给我们收获好东西，而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辟和奠定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向，不能因为其曾经伴生了某些负面现象而加以否定。



近日，“闪亮的青春——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大型图片展览”在香港大会堂拉开帷幕。翔实的历史图片及文物档案，将90年前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再现于参观者面前。图为香港学生在展览上观看展出的图片。

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摄

学术动态

本版责任编辑：叶帆 朱佩娴
电子信箱：yefan@peopledaily.com.cn

《漆侠全集》首发式暨座谈会召开

《漆侠全集》首发式暨座谈会最近在北京举行。与会者肯定了《漆侠全集》出版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漆侠先生的学术成就。

漆侠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辽宋金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为了更好地总结漆侠长达半个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经过四年的搜集、编辑、校对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2卷本的《漆侠全集》。《漆侠全集》不仅收录了漆侠的《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辽夏金经济史》等9部著作和《求实集》等3部论文集，还收录了未发表的教材和讲义《两宋史史》、《中国中世史》、《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

（朱佩娴）

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召开

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最近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几年来当代北京史研究会所做的主要工作：协助做好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北京卷的工作；尝试推进当代北京史的科学普及工作；搭建平台，促进交流，开展一系列学术研讨活动；积极组织开展口述史学的编撰工作；等等。与会者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对当代北京史的研究，就是要为北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存史、立言、资政、育人等方面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萧 舫）

学术信息

老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在一些人的印象里，老子是一位遁世远俗、玄之又玄的思想家。事实上，社会人生、治国理政等问题，才是老子关注的中心。从老子那些古老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明晓盛衰之道、成败之数。

大德非小惠。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也就是说，真正有大德、厚德的人，不刻意去追求有德，反而有德；一些人不愿意失去德的名声，刻意去追求德，反而失去了德。这句话看似矛盾，其实蕴含智慧。对于理政者而言，德的重要表现就是使人各得其位、各得其所，各得其利、各得所需。只要把人们的得利、得位及其途径、多少、高低等用合理的规则固定下来并严格执行，就是德的表现，不必刻意去求德施德，这样才会成全大德。相反，如果理政者总是为了德的名声，热衷于对个别人施小仁给小惠，搞“有求必应”，表面上看起来积了很多德，其实是偏私，是小惠个人、失德人民。

“无为”方能大有为。老子推崇“无为而治”，“无为”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无为”是要“道法自然”，顺应自然而不要为。也就是说，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法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宜行动。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有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即“道”。离开了这个“道”，事倍功半；顺应了这个“道”，事半功倍。“无为”，就要顺势而动，按照自然和社会法则，使其自行运转。“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通过“无为”达到有为，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乱作为，即不要为。秦亡汉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是老子所讲的“我无事，而民自富”的例证。对于理政者而言，“无为而治”的启示在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自己的“无为”而引导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应通过控制、监督，限制权力的私自膨胀，防止乱作为。

天道忌盈。老子认为天道忌盈。什么是“盈”呢？口满为盈，权大为盈，富奢为盈。口满，不仅难以兑现，而且招人记恨；权大，则生骄横，骄横必然侵害他人；富贵且奢侈，挥金如土，必然被食不果腹者怨恨。月满则亏，盛极则衰。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这句话点出了贫富无常的道理。怎样才能常盛不衰呢？关键是在成功的时候不忘忧患。有忧患意识，则无忧患；无忧患意识，则终忧患。也就是要做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乐不忘患。

伟业须从细小做起。老子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细小之事如何才能变成伟业呢？老子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说，根本的方法在于不断地积累。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天下大事皆由积累而成。所以，对于理政者而言，从小处做起，从一点一滴积累，抓好关键细节，方能成就大业。事物的发展在于积累的道理还启示人们，积小过会成大恶，千里之堤会溃于蚁穴。因此，理政者应当努力看得远一些、深一些，见事于初萌，防患于未然。

学术随笔

《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

黄少群

余伯流撰著的《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生动展现了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到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作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不但钩沉了一些重大历史事实，而且将一些人们熟知的史料熔于一炉，彰显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该书认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组成的中央三人领导集体，在当时的党内、军内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公信力与凝聚力，不仅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而且为长征胜利后的一系列重大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将三人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归纳为三个时期：中央苏区时期是合作的筑基时期，长征时期是形成时期，延安时期是向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过渡时期。作者认为，毛泽东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张闻天谦虚谨慎、襟怀坦白，周恩来多谋善断、顾全大局。正是因为三人精诚合作、取长补短，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才能够率领全党和全军将士在危难中奋勇前进，在绝境中获得新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而毛泽东在全军和党内最高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张闻天、周恩来尤其是张闻天起到了重要作用。张闻天、周恩来的这一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将永远彪炳史册。

《社会工作视野下的大学生事务管理》

田建国

张书明主编的《社会工作视野下的大学生事务管理》一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特征和需求变化为切入点，深刻分析了大学生事务管理面临的一系列新变化和新挑战，深入探讨了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大学生事务管理各个领域的应用，内容涉及大学生学习的、生活、就业、心理健康、困难资助、自我发展等方面。

纵览全书，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改进创新。作者认为，对大学生事务管理要有更加崭新的视角、更加理性的审视、更加长远的设想。整个管理过程是动态的，不能墨守成规，也不会一劳永逸。只有与时俱进，在动态中创新，

在变化中改进，才能使管理工作保持生机和活力，更好地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二是注重教育规律。作者提出，大学生事务管理要遵循规律、面对现实，在包容多样中确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求得和谐，全面而不片面，辩证而不绝对。应在管理理念上更注重服务，在管理对象上更注重个性，在管理内容上更注重有效，在管理时空上更注重全程，在管理范围上更注重全员。三是推进资源整合。作者强调，大学生事务管理要做到高效便捷，必须整合教育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学生服务体系，完善资源互动网络，在资源共享和信息联动的基础上实现学生服务流程最优化。

该书不仅论点新颖、结构严谨，而且在叙述时情节生动、语言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中国近代老年史》

李忠东

在中国近代各群体的研究中，妇女史、青年史、工人史等各有专项研究，唯老年史尚付阙如。马庚存撰著的《中国近代老年史》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以年代为经、人物为纬，反映了在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众多老年人与其他群体一样忧心国事、感伤民艰、追求新知、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一定意义。

研究老年群体，既要涉及人物以往的活动，又要突出老年阶段的言行功过。面对这一难题，作者独辟蹊径，在适度叙述近代社会演变和交代人物履历的基础上，集中探究老年群体的

演变，反映老年世界的风貌，紧切女史、青年史、工人史等各有专项研究，唯老年史尚付阙如。马庚存撰著的《中国近代老年史》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个空白。该书以年代为经、人物为纬，反映了在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众多老年人与其他群体一样忧心国事、感伤民艰、追求新知、与时俱进，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一定意义。研究老年群体，既要涉及人物以往的活动，又要突出老年阶段的言行功过。面对这一难题，作者独辟蹊径，在适度叙述近代社会演变和交代人物履历的基础上，集中探究老年群体的

新书评介

深刻认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

王聚英

尤秀斌

西柏坡原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建立了解放全中国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共中央在这里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于1949年3月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西柏坡时期，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是即将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建立新中国，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的主要任务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是由革命党和局部执政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转变。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形成了西柏坡精神。在纪念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60周年之际，深刻认识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对于不断推进党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既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对全党的告诫，又是由党所领导的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党即将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历史课题所决定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两个务必”，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对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基本要求，更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从而成为西柏坡精神最为重要的内涵。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当革命胜利即将到来时，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将革命进行到

观点